



【书 评】

《中国佛教文学研究》述评

何剑平¹,刘林魁²

(1.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2.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三者之中,儒家、道教源自本土,佛教源于古印度。由于佛教本身具有的鲜明的异域文化特色及其经历的漫长曲折的中国化过程,它在中国文化中的角色、作用、影响较诸儒家、道教都更为复杂。自佛教入华不久,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性与互动性就引起了中土士人的关注。不过,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则始于20世纪之初。先有梁启超、胡适等学者的首倡,后有郑振铎、陈寅恪、季羨林等学者的发明,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佛教文学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颇为热门的领域。

虽然佛教文学研究已经历近两个世纪,但关于“佛教文学”的内涵长期以来存在争议。普慧先生认为,佛教文学研究的边界和范围,要远远超出时下“文学”所规定的界限。不但“从文学的角度、以文学的方法研究佛教典籍”属于文学范畴,而且“以佛教文学的视角和方法来审视中国文学中的佛教因素以及僧人的文学活动”,也当“属于佛教文学的研究范畴”。故而,在有关佛教文学的“诸多问题和现象尚未探察和考究”之前,不宜过早对“佛教文学”下定义。基于这一理念,普慧主编的《中国佛教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对中国佛教文学领域的诸多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此书由西北大学文学院佛教文学研究团队的9位学者撰写,全书以问题和现象为经纬,按专题组织编排,结构上分为佛教典籍与中国文论、佛教视野中的文人创作、僧人创作与文学发展、佛教文化与小说创作、佛教文献考释与补正等五编。研究内容从汉魏六朝一直延续到清代。共计50余万字。全书内

容大多以单篇论文在相关学术期刊发表,其中相当一些成果被复印、转载,引起过学界的关注、思考。此次整理、修订出版,令人对此一研究团队的整体科研能力有了更新的认识。

第一,重视文献的学术作风。西北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着重视文献的优秀传统。从傅庚生先生的杜诗研究到薛瑞生、韩理洲、阎琦、房日晰等的唐宋文学研究,始终贯穿着以文献为依据的良好学风。佛教文学研究团队秉承并发扬了这一优良学风。如,该书作者之一的李芳民教授穷多年之力撰成《唐五代佛寺辑考》一书,按照唐代的行政区划考察唐代佛寺的修建、沿袭、变更。该书第二编和第五编中由李芳民教授撰写的几节一方面对前著的内容不断补充、拓展,以期拥有更为完备的文献资料,如《唐代佛寺杂考》一文;另一方面,则将佛寺放在唐代文学发展的背景下,将与之相关的文人活动、文学创作与传播、僧俗文学互动等贯通起来,探讨唐代诗人游居寺院习尚的缘由、寺院之游居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以及寺院在唐人小说叙事中的功用,从更为宽广的文化层面上探讨唐代文学构成、发展、演变的诸多文化因素,形成《佛宫南院独游频》《山寺水亭长年吟》《红叶寺游诗兴多》《唐人小说中佛寺的艺术功能与文化蕴涵》等成果。基于扎实的文献功底,李芳民教授的唐代佛寺与文学研究,将具象的宗教活动场所与情感化、性灵化的文学创作打通,突破了佛寺的时空限制,拓展了唐代文学研究的疆域。此外,第五编中赵阳撰写的僧人碑铭考释、王松涛撰写的《唐才子传校笺》补正,同样也浸透着这一学风。

收稿日期:2013-03-11

作者简介:何剑平,男,甘肃敦煌人,博士,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与中国文学。

第二,佛教与文学密切结合的研究路径。佛教与文学,一为宗教,一为艺术,两者学科门类不同,研究路径也不同。佛教文学研究,要实现宗教与文学的结合。但两者的结合、沟通、互动并非都是直线的,其历史痕迹也极少显性表现,这种研究的技术路径、方法学理要高于单纯的佛教研究或者文学研究。因此,有些佛教文学研究者总容易偏向佛教研究。但《中国佛教文学研究》一书,总体上体现出了以文学研究为核心的学科特色。书中第四编贾三强教授撰写的几节,注重从佛教入手解读小说。如《禅门心法——也谈〈西游记〉主题》,从小说的情节演进、人物性格、回目题名等方面力证《西游记》的主题为“渐修顿悟”的禅门心法。《凌濛初“二拍”中的因果报应观》《凌濛初之从佛与〈硬勘案大儒争闲气〉中的佛教平等观》,从佛教价值系统出发,或者考察佛教价值对官僚机构和民间非道德倾向的不同整肃,或者考察作品的主题倾向。《析〈红楼梦〉的宿命结构》则从佛教色空观入手,分析作品的情节和中心人物宝玉的归宿。成明明的僧诗与诗僧研究,杨遇青的佛教与明清文学思想研究,同样体现了中国佛教文学研究团队的学科定位特色。

第三,准确敏锐的问题意识。佛教文化博大精深,既有经、律、论等佛教典籍,又有中、印文化的差别,不同学派、宗派修行观念的不同,更有上层社会与下层民众对佛教知识、信仰、思想、仪轨等不同接受。如此复杂的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自然有明有暗、有亲有疏。故而,从事中国佛教文学研究,必须具有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浩如烟海的宗教文献中发现文学学科问题的能力。西北大学佛教文学研究团队的研究,恰恰在这一方面非常出色。张文利教授从禅学、理学关系进入宋代诗学研究,李芳民教授从佛寺的历史地理文化入手研究唐代诗文,贾三强教授从佛教价值的考察进入明清小说研究。而孙尚勇教授的佛经偈颂研究,更能突现其敏锐的问题意识。他认为,佛经偈颂是在佛经汉译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文体,既有源自印度的文化根底,更受到中土文化尤其是中土诗歌的影响。由此,他从偈颂翻译的程式入手,考察

佛经偈颂对于中古诗学的研究价值,并由佛经偈颂翻译的程式推及敦煌文学创作程式,如《中古汉译佛经偈颂诗学价值述略》《敦煌文学的程式化特征及其来源》等成果。他的《论〈大唐西域记〉所载佛说〈毗摩罗诘经〉遗址》《释僧祐〈经呗导师集〉考论》,更能从常见文献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

第四,细致严谨的学术态度。如前所论,佛教文学的研究跨越两个学科,出入文学、宗教,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国内研究中国佛教文学的学者虽然人数众多,但由于对这一领域缺少长期关注,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研究恰似走马观花,浅尝辄止。如此导致学术研究出现两个极端:一是重复研究成果,一是有“大胆设想”而无“小心求证”,从而使研究陷于空疏。《中国佛教文学研究》一书立足文献推理论证,其结论大多客观可信。如普慧先生《佛典汉译及汉译佛教哲学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按照中国诗学理论范畴与汉译佛教哲学关系的亲疏,将其分为三种情况:直接从汉译佛教哲学中引用范畴,运用到诗学之中,如真实论、现量说、境界说等;用佛教的思想改造中国原有范畴,使之成为具有浓郁佛教特色的诗学审美范畴,如虚境说、言意说等;根据佛教思想结合某些中土原有思想创造新的适合诗学的审美范畴,如性灵说、神韵说等。这种研究,从实际出发进行学理分析,不夸大佛教的影响,充满了严谨的学术态度。又如孙尚勇的《经学章句与佛经科判及汉魏六朝文学理论》,在考察传统经学的章句之学、佛学传统中的科判之学基础上,认为经学章句启发了佛经科判,佛经科判又反过来在义解和术语两方面影响了六朝隋唐的经学义疏。此一结论可能比直接说佛经科判影响了汉魏六朝文学理论,更有说服力。

经过30年的建设,西北大学佛教文学研究已经逐渐形成年龄构成相对合理、学术研究方向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中国佛教文学研究》是这一研究团队学术实力的集体亮相。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以四川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为核心的三大研究重镇。《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出版,将预示着又一个佛教文学研究重镇的形成。

[责任编辑 赵琴]